



高考改革的 理论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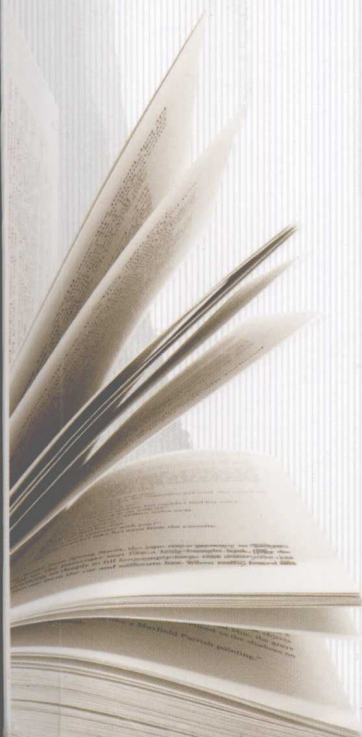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刘海峰 主编

刘海峰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3JZD0038）资助

高考改革的 理论思考

刘海峰 著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刘海峰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刘海峰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刘海峰主编)

ISBN 978-7-5622-3643-6

I. 高… II. 刘… III.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教育改革—中国—文集
IV. G647.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4015 号

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

© 刘海峰 著

责任编辑:冯会平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仙桃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68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2.00 元

总 序

1977 年恢复高考,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其划时代的重要性不亚于 1949 年以后的许多历史事件。恢复高考 30 年来, 高考在促进中学生努力学习, 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高考的公平竞争, 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人才,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 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高考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的教育考试制度。作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桥梁, 高考不仅对中学的教育和教学, 大学的新生选拔具有调节与指挥作用, 而且承载着整合教育系统, 维系社会稳定的重任; 它上关国家安定和民族前途, 下系青年学生的个人命运和千家万户的喜乐哀怒, 因而历来是中国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当这种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在长期实行及利弊得失都充分显露出来以后, 更是受到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然而, 当今人们对于高考这么一项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重要制度的看法见仁见智, 总体而言是“三多三少”, 即新闻报道多, 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一般议论多, 深入分析相对较少; 零星探讨多, 系统研究相对较少。由于高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 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制度, 站在某一种特定的立场去评说, 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 可能所见都是事实, 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 但也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因此, 在评价高考时, 重要的是应全面和客观, 而要理性地、全面地评价高考, 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 就应该对高考作深入的研究。

对我国高考的理论研究, 以往与许多国家一样, 多偏重于考试技术方面的研究, 也就是考试的科学性问题的研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高度重视考试的国度里, 类似于高考这样的大规模竞争性考试所出现的问题, 不仅仅是考试的技术性问题, 而更多的是考试的社会学问题。因此, 国际教育评价协会每年年会多注重考试的科学性问题的研究, 但 1996 年 9 月, 国际教育评价学会在北京举办的第 22 届年会选定的主题却是“大规模考试的作用及相关问题研究”。世界各国的大规模教育考试都有强大的评价和筛选功能, 也各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它不仅是一个考试古国，而且是一个考试大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招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只是引起小范围的关注，只是部分人关心的话题。然而，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却将高考变成了文化，变成了经济，变成了政治，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各方面关注的社会活动，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在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和千余年科举考试历史的中国，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和城乡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中国，在民众高度重视甚至是过度重视教育的中国，高考既有与世界各国的选拔考试相同的规律，也存在不少独有的现象和问题。

高考改革是一个谁都说得上的话题，同时实际上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要谈谈自己关于高考改革的观点，发表一两篇文章不难，而要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不重复的系列论文却很难。目前还很少有专门的高考改革研究专著，更没有成系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为了将高考研究推向深入，并为现实高考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特组织编写了这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作为中国高考研究的重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尤其是以院为依托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将高考改革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全国和部分省市的高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我历年指导的众多博士论文中，以高考研究为选题的占大多数。要想真正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我们的研究应建立在对招生考试历史与现实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为了使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至于陷入空谈，我总是要求博士生多了解高考实际。近年来，每位以高考为选题的博士生都要到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实习，在每年的七八月间参加该院的录取入围工作，真正深入到招生考试第一线，多与考试管理工作接触交流，才不会太书生气，所写论文才能脚踏实地。每个人的研究各有专攻，但希望都能切中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本丛书是我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为基础构成。欣逢全国上下都在纪念高考恢复和议论高考改革问题，本丛书的出版算是为纪念高考制度恢复 30 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

刘海峰

2007 年 8 月 6 日

目 录

一、坚持统一高考

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	(3)
再论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	(9)
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	(17)
论坚持统一高考的必要性	(22)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三论坚持统一高考	(29)
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	(38)
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47)
高考改革何去何从	(54)

二、为高考辩护

高考并非“一试定终身”	(61)
高考竞争的本质与现象	(68)
高考改革的教育视角与社会视角	(76)
高考与录取制度改革问题	(86)
高考改革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92)
传统文化与两岸大学招考改革	(100)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	(111)

三、推进高考改革

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	(117)
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	(123)

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133)
高考改革应稳步推进	(142)
高考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149)
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兼论科举时代的“冒籍”现象	(159)
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	(172)

四、恢复高考 30 年

“而立之年”论高考	(193)
1977 年高考：一次空前绝后的招生考试	(200)
论高考的恢复与改革	(208)
“三十功名尘与土”——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	(220)
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	刘海峰 曾子墨 (228)
与刘海峰教授谈蒋多多事件	宋晓梦 (240)
从统考历史存废看高考未来变革——对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	原春琳 周 珣 (244)
后 记	(249)

一、坚持统一高考

(continued from page 6)

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着重探讨经济、政治与高教关系的同时,部分学者也将研究视角投向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层面。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既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产物,又无法仅用政治体制的制约这一点来解释,还应探寻较为深隐的传统文化因素。当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时,不可只从经济或政治角度出发,而应顾及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

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以来,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中生活、成长。我们既不能脱离传统,也无法自由地选择传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传统文化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且无论是精华或糟粕,都在起作用,想要全面否定和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既不足取,也不可能。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可以有所改造、有所革新,但文化的变迁是缓慢的、渐进的,甚至是保守的,一些旧传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改造而脱胎换骨。我们可以看到或预见到,符合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改革较易推行并取得成功,而与传统文化不相适应的改革则往往行不通。因此,我们在进行各种改革,包括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时就应考虑到中国的文化国情。以下仅对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及“宽进严出”两个问题加以论述。

一、关于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改革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处于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点上,历来是整个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论者以为全国统一高考是计划经济的模式,限制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了将市场机制引入高考,应该打破全国统考统招的局面,改

为各校自主招生考试，或者主张以高中会考成绩和在校表现等综合因素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依据，以便克服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弊端。实际上，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未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制约因素的主张。若真的推行，其弊端将超过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和重视五伦关系，是一种具有“社会取向”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这当然有其长处，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和亲友关系可以无限膨胀，形成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使人们信服人情高于一切，人际关系决定一切。因此，托关系、走后门的裙带风盛行不衰，许多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人情困境”之中^①。高校招生考试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关键在于排除人情的困扰和权力的介入，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还是实行统一考试。在这方面，以往已有很多的教训。且不说“文革”后期实行推荐上大学出现的弊端，就是现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充分说明了采用统一考试的必要性。本来硕士生招考五门科目，政治、外语两门为全国统考，原本的用意是作为水平考试，另外三门专业科目是考查考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有选拔考试的用意。实施的结果是，各校单独组织命题的专业课考试多数考生都能取得及格或优良成绩，很难起到选拔性考试的作用，而具有水平考试性质的政治和外语两科却不由自主地变为关键性的科目，不对此划线就难以掌握复试人数，外语和政治几乎成了选拔性考试科目。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有中央宏观调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各校各专业单独命题、单独评卷，较难做到保密和公平。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家教委将起初由各校单独命题的考试一度改为由全国统一测试，实在耐人寻味。

与我们具有相同传统文化背景的台湾地区，从1954年以来，也实行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这种统招统考的办法，虽然难免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等弊端，并且在1984年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改进，但直至现在统一考试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台湾的大学联考制度既受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又受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所形成的公平竞争观念的推动。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庭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等皆为家庭宗法制的派生

^①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见张文达、高质慧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3—195页。

物。此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影响到现代台湾社会便是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和特权盛行。台湾大学联考存在的首要价值是其公平性，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大学选才的干扰。社会大众对大学入学方式关注最多的就是公正公平。因此，尽管一些教育主管官员和部分专家力图改变统一考试方式，最后还是将大学联考维持了下来^①。

据台湾《教育资料文摘》记载：1992年初，台北市教育局决定在1992年9月开始提前全面实施“国中生自愿就学方案”，以就近入学代替高中联合招生考试，台湾“教育部”也表示“乐观其成”，结果却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专家学者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台湾“救救下一代行动联盟”、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等多家团体联合声明表示反对提前实施此方案。在对大学教师、教育行政人员、中学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5%的受访者仍然不愿废除高中联考。尽管实行此方案可舒缓升学压力、促进教学正常化，但有57%的人认为以国民中学（初中）的成绩决定升学，教师给定的成绩会影响升学机会，会造成家长送礼及人情、特权介入等现象。其他民意调查也显示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自愿就学方案”会使教师权力过大，无法真正做到公平。最后台北市教育局只好取消全面面试办方案。这说明无论是高中联考还是大学联考，各界人士都很看重考试的公平性。

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为了能够客观地选拔人才，历史上从隋唐至明清都是实行统一的科举考试。科举制的长期实施，形成了注重统一考试的传统。废科举后，清末民国时期，各高校一般独自招考学生。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陆和台湾的高校不约而同地走上统一考试的轨道，既减少了各校分别命题的麻烦，节省人力物力，又可排除人情困扰，收公平竞争之效，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大陆和台湾政治制度迥异，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为什么却殊途同归，形成基本相同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受文化因素的制约。而且，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韩国、朝鲜、日本等国的高校入学考试形式也与中国类似。因此，统一考试并非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为改革而改革。如果没有周密的配套措施，不顾传统文化的制约，贸然将高校统考改为各校单考，所引发的弊端将远远超过统一考试的局限，而且最后还必将回到统考的老路上来。

^① 刘海峰：《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中国高校招生》1993年第1—3期。

二、高校“宽进严出”论辨析

与改革统一招生考试密切相关的是有些高校实行“宽进严出”的办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高等学校要尽量向适龄青年开放，不要以“一考定终身”。要改革统一考试模式，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让更多的青年入学。在校期间学校教师严格要求，用高淘汰率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一个时期以来，主张高校“宽进严出”的论者还着实不少。然而，面对现实和中国国情，笔者认为，高校“宽进严出”是很难实行的。勉强推行“宽进”，很可能导致“宽出”，其后果是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而其主要根源也可以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和”即追求和谐的中和主义。“和”的人生观，表现在古人以中庸为准则的处世哲学上。中庸的本义是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注意避免“过”或“不及”两个偏向，以便保持各种矛盾和关系的和谐统一^①。古代“和”的人生观一方面使中国人注重个人品格修养，待人接物讲究礼节，养成了谦和善良、温柔敦厚的品格。另一方面，中庸之道却由争取积极的“和”，异化为追求消极庸俗的“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情留一线，久后好相见”一类世故的庸人哲学也因此盛行。古代社会流传极广的《增广贤文》一再提倡“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格言，极力劝导人们尽量不要与他人过不去。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能够坚持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铁面无私严格把关的教师为数并不多。这便是为什么不少学生的许多课程成绩都恰好是60分的原因。即使有些学生离及格线还差得较远，面对学生的求情，有些教师也会萌动恻隐之心，在补考时让其过关，除非实在是差到离谱的程度，多数补考者总有办法补考合格。

难以做到宽进严出的另一原因是受对大学生身份的传统看法的影响。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在官本位的体制中，士为四民之首，所有职位都有官品区别。与此相应，中国古代将进官立高校学习视为入仕的预备阶段，学生具有“准官员”的身份和地位，不仅可以免去赋役负担，免交学费，而且

^① 郑师渠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漫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25页。

可享受政府供给的免费食宿待遇^①。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学生一旦考上大学便等于端上了铁饭碗,成为国家干部的预备力量。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等于拿到了城市户口,跳出了“农门”。这样,大学毕业与未能毕业两种选择之间的差别太大,因严格要求而导致学生退学将严重影响学生的前途,于是,一些教师自然会手下留情。在实行收费上大学的招生改革后,许多教师体恤学生求学的艰辛,更不忍让学生中途辍学。要真正做到“宽进严出”谈何容易。

还有一个导致高校“宽进严出”难以实现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中国人向来好面子。林语堂曾说:面子、命运和人情是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三位女神^②。在多数人眼中,进了高校却因学习成绩差而无法毕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不仅自己没面子,就连自己的父母家人也脸上无光。看看各个高校,有多少学生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的。少量的退学者基本上是因为违犯了纪律或身体原因,而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合格。在80年代后期不少高校推行的中期选拔或中期淘汰制,曾作为一项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加以宣传,然而因中期淘汰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讲人情、重面子观念相冲突,真正能从本科淘汰下来按专科毕业的寥寥无几,这项改革最后只能流于形式或无疾而终。

与此类似的是研究生的中期分流制。一些大学曾规定特别优秀的二年级硕士生可提前攻读博士生或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课程成绩不合格或研究能力较差者则提前按研究生班毕业,其他则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实行多年之后,分流实际上只体现了提前“攻博”和进入论文阶段的区分,而分流机制渐渐地名存实亡。特别是在取消研究生班毕业这一层次,规定读完两年课程离校者只能按研究结业或肄业以后,中期分流就更是形同虚设了。以厦门大学为例,厦门大学从1989年开始实行研究生中期分流制,起初还有一定的效用。1989年分流出去4名,其中包括1名博士生;1990年分流6名;1991年分流5名。此后因阻力越来越大,从1992年至1995年,除了1名因考试作弊违纪被分流以外,4年中没有一个被分流出去的,成绩较差或科研能力较弱的最多只给“筛选警告”。导致中期分流走过场的原因还是前述的讲人情、重面子的社会行为和观念。这就难怪多年来研究生素质不见得逐年上升,而分流离校的人数却逐年

^①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下降了。

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的作用虽然是隐蔽的、潜在的，但又是持久的、深刻的^①。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当高等教育改革与传统文化相一致，至少不相抵触时，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种促进力量，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反之，当高等教育改革与传统文化相冲突时，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股强劲的阻力，阻碍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或者使高等教育改革偏离预定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精华或糟粕都对现实生活起着一定的作用，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是不宜改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为各校单独招考的，也是难以做到“宽进严出”的。在传统文化未见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各校单独招考必将增加权力干预、金钱购买的现象和高校“低门槛入，低门槛出”。只有当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时候，只有当社会风气出现明显好转的时候，才能减少以统一考试分数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权重，才能真正做到“宽进严出”，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原载《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

^① 参阅潘懋元、朱国仁：《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再论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

考试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其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因此，自从中国人发明考试制度以来，有关考试的争论历来不断。现行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关系到千家万户以及地方、学校等各方面的利益，其改革牵涉面广，不仅对高等教育，而且对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系统都有重大影响，而其影响又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因此，人们很容易见仁见智，产生歧异的观点。

1995年3月，笔者在汕头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并作了大会发言，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共鸣。随后《上海高教研究》于1995年第3期发表了该文。限于版面，原稿经编辑部作了部分删节。《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5期刊出唐安国同志的《改革是向传统文化的挑战——与刘海峰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唐文）一文，对笔者前文有关坚持统一招考和不宜实行“宽进严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细读之后，觉得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先就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问题再陈管见，以就教于高教学界的同仁，并回答唐先生的商榷。

一、传统文化的两重性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它既有一些精彩的要素和闪光的方面，又有不少落后成分和消极因素。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常杂糅在一起，难分难解。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既可以从汉唐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上找出健全自信的开放品格和文化特性，又可以从清初闭关锁国的史实中找出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传统文化既有革新进取的一面，也有保守固执的一面；既重视家庭和人际的协和，又常使人不得不面对人情的困扰等等。传统文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它的某些方面可能促进我们

民族的振兴腾飞，某些方面也有可能阻碍社会的前进发展。

文化的变迁一般是缓慢的、艰难的，对传统文化加以创新、改造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如过去我们提倡“破四旧”，但今天一些封建迷信之类的落后习俗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时常见。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应加以弘扬，而对其消极方面则需作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而且往往需要靠法律、靠制度化的手段来克服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

笔者在《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一文中，强调了与招生考试有关的传统文化中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一面；同时也提到了台湾大学联考制度既受中国大一统观念的促成，又受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所形成的公平竞争观念的推动。科举制的长期实行，在中国形成了注重统一考试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精华或糟粕都对现实生活起一定的作用。多数读过笔者前文的人，应该不至于像唐文那样以为笔者的归纳是“重人情、面子和关系这一类传统文化氛围能促进高等教育改革”，而会明白笔者的主旨是讲改革要考虑到传统文化各方面的制约因素。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科举时代在考试实践中形成了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当然是相对的平等），是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能可贵的一个闪光的要素，也是传统文化中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一个方面。统一高考正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公平竞争观念，在选拔人才时从制度上防止人情关系、裙带关系的大量出现，防止走后门的现象随意发生。

在目前高等教育还未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和社会风气并不太好的情况下，改掉统一高考看来却是对公平竞争传统的挑战，而非对重人情与关系的传统的挑战。这种“改革”恰恰是迎合了传统文化中人情泛滥这一糟粕部分，使金钱与权力更加方便地进入高校招生环节，加剧社会的不公，使高考这块现今难得的一方“净土”也消失于无形中。即使提出“改革”者的初衷是美好的、理想化的，但实行之后很容易偏离预定的目标。

二、统一高考的由来

讨论现行高考改革问题，首先必须真正了解统一高考的由来。唐文说：“人所共知，大陆统一考制是模仿苏联的结果，带有一点‘洋’味，而台湾地区的大学联合招生与大陆的统一考试并不相同，相当一部分私立大学（60%以上）仍然各自招生。即使纳入联招的大学，也都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协调行为，并